

滇青铜文明中最具有代表性的文物——

热热闹闹的贮贝器

任秀玲

在古滇文明中，有一种独特的青铜器——贮贝器。20世纪50年代，在云南晋宁石寨山、江川李家山等地出土一批古滇国货币（贝壳）和超过万件的青铜器，贮贝器便是其中之一。贮贝器，字如其名，“贮藏贝币的青铜器”，用通俗的说法，就是现在的“存钱罐”。当然贮贝器不仅用来贮存贝币，更是财富、权贵、地位的象征，也是祭祀先祖的重要器物，具有浓郁的地方特色和民族风格，在其他地区从未被发现过。贮贝器自发现以来便被国内外学界所关注，被称为滇青铜文明中最具有代表性的文物。

大约两千多年前，在云南昆明滇池

地域有一个古王国——古滇国。古滇国是一个内陆国，距离大海很远，而且是高原山区，在交通极不方便的古代，海贝这样的东西在古滇国十分罕见，甚至跟金银一样珍贵。随着古滇国逐渐升级以物换物的经济模式后，急需“一般等价物”来成为交换的中介，由于海贝在内陆地区较为稀有，所以海贝也开始当作货币来使用。为了储存这些贝币，有钱的贵族们特意铸造了能与之匹配的青铜贮贝器。

贮贝器由青铜打造，本身就价值不菲，只有王公贵族才有可能使用。据史料记载和考古研究证实，当时云南大部分地区仍处在以物易物阶段，贝壳货币

并不是很通行，贮贝器多是作为一种礼器随葬于规格较高的贵族大墓中。贮贝器的铸造难度和艺术呈现代表着当时先进的生产力和审美水平，可见当时的古滇国已经是一个非常发达繁荣的社会了。到了东汉年间，古滇国逐渐融入中原文化，古滇文明也融入中华文明的历史长河当中，退出了历史舞台，而贵族们的财富和贮贝器也一同被埋入地下。随着贮贝器的现世，再次揭开了古滇国神秘的面纱。在对于贮贝器的发掘研究过程中，其身上所呈现出的艺术形象及工艺特征不仅代表了当时云南地区青铜铸造的最高成就，也是一种生活场景的记载，是云南青铜文化的瑰宝。

出土的青铜贮贝器有多种形状，最独特的部分莫过于精美的器盖，采用立体雕塑、分铸再焊接的技法，以细致入微的写实手法进行装饰，描绘出古滇国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极具典型性、情节性和故事性。表达的主题包括人物、牛、马、虎、鸟、兽等，题材十分多样，展现了当时战争、祭祀、狩猎、纳贡、纺织等各种场景，极具艺术审美价值。有的盖径30厘米上雕铸出十多名人物形象，可谓场景丰富，热闹非凡。贮贝器这一小小存钱罐堪称“微缩版的滇国人文自然史书”，通过它们，我们才得以一窥两千多年前的古滇文明。下面让我们欣赏几件极具代表性的贮贝器……

1 杀人祭柱场面铜贮贝器

西汉时期器物，云南晋宁石寨山1号墓出土，国家一级文物，现藏于云南省博物馆。高38厘米，器盖直径30厘米，为铜鼓形贮贝器，有盖有底，内存海贝。鼓的腰部刻有8人，各手持矛、弩或斧等兵器在奔跑狩猎。盖子中间立有一高9厘米的柱子，两条蛇盘旋其上，柱顶有一只老虎。

鼓上祭祀场景中共有52人，场景展现为正在进行过程中的祭礼。杀人祭柱场面铜贮贝器描绘的祭祀活动颇具寓意，祭柱即祭祖。场景中人物众多，少部分人在参与祭祀典礼，大部分人在利用祭祀场所进行贸易交流。



2 诅盟场面铜贮贝器

向上攀爬状，虎尾下垂外翻，两只老虎身上的纹饰一为圆点纹，一为线纹。器盖上铸有复杂的祭祀场景，雕铸人物129个，还有干栏式建筑、铜鼓、铜柱、鼎以及动物，是滇国青铜器中最复杂的一件，也是迄今为止发现的贮贝器上雕铸人物最多的一件。

诅盟为古代西南民族中极为盛行的一种风俗，凡有重大事件都要用盟誓来约束，设立祭坛，供奉祭品，举行典礼。通过器物上雕铸的人物的穿戴和行为，我们能够了解到古滇国已经有了很明显的阶级划分。同时也由此了解了当时的滇国还和周围的国家有频繁的贸易往来，而这个祭祀广场，同时也是一个进行贸易往来的广场。诅盟场面铜贮贝器与杀人祭柱场面铜贮贝器被列为禁止出境的国宝级文物。



3 贡纳场面青铜贮贝器

云南晋宁石寨山出土，现藏于中国国家博物馆，在“古代中国”馆长期展出。此器原由重叠的两鼓组成，出土时上鼓已残，下鼓鼓口铸有立体人物、牛马等，腰间铸4环耳，器身下部铸4卧牛。器盖上铸人物、牛、马等共21个，其中人物或佩剑，或负物，或扶鞭，或牵马，表现了部落首领向古滇王纳贡的场景，对研究滇国的经济、政治具有重要意义。

东西更著风云景 丝路新篇慰郑和

马颖娜

志合者，不以山海为远。六个多世纪前，一位来自云南的中国航海家率领船队沿海上丝绸之路，于公元1405年（明永乐三年）至1433年（明宣德六年）七下西洋，历时28年，和平造访了亚非30多个国家和地区，留下了中国与沿途各国人民友好交往的佳话。这位“云帆高张，昼夜星驰”的伟大航海家就是郑和。

敢为人先 若履通衢

郑和下西洋的伟大历史事件，开启了东西方包括文化、贸易在内的多层次交流，拉开了15世纪世界“大航海”活动的序幕。郑和下西洋，让中国从海上走向了世界。永乐初年，郑和奉命出使西洋。在明初的地理观念中，南海诸国以婆罗洲（今文莱）为中心，分为两大区域，以西部分为“西洋”，以东部分为“东洋”，郑和远洋经过的地方多在“西洋”区域，因此习惯上称为“郑和下西洋”。永乐三年，2.7万余人的庞大舟师，“涉彼狂澜，若履通衢”拉开了中华民族走向远洋的序幕。船队第一次出使西洋，使用船只62艘，船长44丈，阔18丈，每艘船可以容纳上千人，是当时世界上最大的远洋船队。郑和舟

师的航海设备如罗盘针、航海图等，也堪称当时世界一流，特别是其编制的《郑和航海图》成为世界航海史上首部航海图集，记载了530多个中外地名，明确标出了南沙群岛（万生石塘屿）、西沙群岛9（石塘）和中沙群岛（石星石塘）等重要地理标志。船队从太仓刘家港起锚经过福建后远航，途经今越南、泰国、马来西亚、印度尼西亚、斯里兰卡等国，最远到达波斯湾、红海沿岸以及非洲东海岸赤道以南地区，这是世界航海史上的空前创举，比1471年葡萄牙人达·伽马绕好望角到达印度洋时间早半个多世纪，比麦哲伦到达麦哲伦海峡早116年，比1492年哥伦布横渡大西洋到达美洲大陆早87年。沧海云帆卷，惊涛骇浪，暗礁险滩都为远洋航行设下了重重险阻，凭借“敢为天下先”的非凡胆识和机敏才干，郑和及所率领的舟师完成这项前无古人的创举，历经一生终让天涯山海变为中国与各国友好交往的重要历史见证。

互利共赢 文明交流

各国间友好交往总是双向的，“郑和下西洋”不仅是互利共赢的贸易之旅，更

是互鉴互学的文化之旅，在航海途中，“以次遍历诸番国，宣天子诏，因给赐其君长”大大扩大了中国在海外的知名度。郑和下西洋开展贸易活动的形式多样，朝贡贸易是其中一种主要的贸易方式。船队每到一地，便以皇帝的名义向各国国王颁赐银印、冠服、礼品等，并接受他们的纳贡，或由他们事后遣使到中国朝贡。这种贸易形式，实行“厚往薄来”的贸易原则，往往是赏赐数额大于贡纳。同时，由于各国都对中国的青瓷盘碗、丝、绛、绢等物品“甚爱之”，在暹罗国（今泰国），“中国宝船到，亦遣小船到水上买卖”；在溜山国（今马尔代夫附近），“中国宝船一二只，收买龙涎香、椰子等物”；在柯枝国（今印度港口），“等候中国宝船或别国番船客人来买下宝珍、珍珠、香货之类”；在天方国（今沙特阿拉伯），“买到各色奇货异宝，麒麟、狮子、鸵鸟等物，并画天堂图真本回京”。由于郑和船队交易公平，交易双方互利共赢，伴随“下西洋”开展的商贸活动可谓盛极一时，于是便出现了“天书到处欢声笑，蜚蜚酋长争相迎”的生动历史记载。郑和远洋还肩负着传播中华文化的重任。在航海沿途郑和船队将中国的历

4 四牛鎏金骑士贮贝器

直径25厘米，平底，下有底足，器腰两侧各装饰一个虎形耳，虎作向上攀爬状。器物盖上有四只体格健硕的牛逆时针围绕中心作奔跑状，而中心有一个圆柱柄托盘，托盘上有一身佩宝剑的滇族骑士，通体鎏金，骑一高头大马，英勇威武。战马昂首挺立，马尾挥洒上扬，口微张，目光锐利且炯视前方，在众牛的环绕下，这位鎏金佩剑骑士跃马而起，细节刻画详尽，宛若真人。四牛鎏金骑士贮贝器采用了铸塑、焊接、鎏金等工艺，大大丰富了形制，体现了古滇国青铜铸造的超高科技。2018年12月3日，四牛鎏金骑士贮贝器亮相央视栏目《国家宝藏》第二季。

5 八牛贮贝器

1956年于云南江川李家山出土，现藏于上海博物馆。贮贝器高51厘米，底径29厘米，重15.2千克，器物呈束腰圆筒形，出土时内装有贝币。圆形器盖上立有一大七小共八头牛，也因此得名“八牛贮贝器”。形态各异的八头牛身形健壮有力，中间的大牛昂首立于鼓型座上，七头小牛低首垂尾环绕在盖沿，牛角尖利高耸，直指天空，造型逼真，极富动感。器物内束的“腰部”两侧分别铸有一虎形耳，周身有细致的阴线刻划纹饰，形态威猛，怒目利齿，似正在沿器壁向上攀爬，意欲将器盖上的牛取而食之。器物为平底，三只兽爪形足，器形规整周正，线条流畅，配合上虎、牛雕塑，构成一幅惊险而又生动的“猛虎狩猎、群牛防守”图，趣味十足，古滇国人将代表财富的牛之形象搬上“存钱罐”，其寓意不言而喻。

6 西汉战争场面贮贝器盖

雕铸一组人物13人，马一匹，反映了当时的滇族与昆明人两军交战的激烈场景。其中一方是椎髻的滇国将士，一位通体鎏金的骑马将，所骑之马昂头翘尾，脖子下系着一个斩获的敌人首级，四周一群装备精良的士兵正在进行激烈战斗，他们戴头盔、穿铠甲，意气风发；另一方为辨发的昆明人，均为步兵，气势上与滇国人完全相反，有的受伤倒地，有的跪地求饶，有的身首异处，呈现出败势。这类贮贝器多以细致入微的写实手法，形象生动的细腻雕琢，描绘古滇国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

扬帆丝路 奋楫沧海

郑和在七下西洋的过程中，充分尊重沿途各国的文化风俗，不以大国之势凌驾他人，加上郑和个人出色的外交才能，赢得了沿线各国的尊敬和爱戴，拓展了和平外交局面。永乐五年（公元1407年），郑和率领船队到达旧港（今苏门答腊岛东北部），听当地居民诉说海盗猖獗，阻塞航道，掠

7 西汉虎牛搏斗贮贝器

1996年于云南晋宁县石寨山71号墓出土，现藏于云南省博物馆。贮贝器通高42.8厘米、盖径23厘米，器内贮满贝币。器身作细腰圆筒型，局部饰阴刻勾连螺旋纹，腰部铸有左右对称两虎形耳，底有四只片状兽足支撑。器盖上铸有两牛一虎搏斗场景：一虎居中作嘶吼状，两侧各有一牛，均作搏斗状，虎一条后腿被牛角挑穿。器盖中心还有一棵树，上有两猴两鸟，两猴相背蹲在树枝上，尾相缠绕，两鸟作惊恐之状，振翅欲飞，体现了搏斗场面的异常激烈。仔细观看这一场景，感觉像是看了一场古滇国的“动物世界”，连它们撕咬的声音仿佛都能听到。这件贮贝器上的两头牛牛



显“王者之态”，将“百兽之王”逼人绝境，大概是意喻墓主人生前征服劲敌开疆扩土的人生境遇。

8 西汉纺织群像贮贝器

贮贝器，其器盖上的人物形象一般可分为奴隶主、贵族、奴隶和士兵等几类。古滇国是一个奴隶制国家，故此奴隶主与贵族的形象十分常见，盖上的场景也多与墓主人生前的活动内容有关，常见于祭祀、战争、生产生活等场面。主角一般形象高大、表面鎏金，这件“西汉纺织群像贮贝器”器高48厘米、盖径24厘米，正中坐立通体鎏金的一位贵妇，正在监督女奴纺织，将当时的生产生活场景刻画得淋漓尽致。



另一方为辨发的“昆明人”，装备落后，呈溃逃之势。

10 叠鼓形狩猎场面贮贝器

西汉时期器物，出土于云南晋宁石寨山71号墓，现藏于云南省博物馆。两鼓上下重叠焊铸而成，有底有盖，器内满贮贝壳。上面鼓腰足部焊铸四鹿，下面鼓腰足部焊铸四牛，胴部与腰部交界处有四绳纹耳。器盖上铸有狩猎场面：共3人，均身背长剑，其中两人骑马，左手握马绳，右手握兵器（已残），策马共同追猎一头奔跑中的鹿，其中一人通体鎏金。第三人站立于器盖中央，双手执长剑兵器（已残），欲猎杀另一头鹿，此人前后各有一犬，分别欲扑向两鹿。两骑士马下分别有一兔一狐。这类狩猎题材的“存钱罐”，往住人物和动物的一丝一发都做到了形象逼真，刻画精准，尤其是动物的四足都以奔跑状来表现，故此整器给观者以活灵活现之感。

据专家考证，贮贝器是云南地区滇族特有的青铜器形制，一般出土于规格较高的贵族大墓里，在普通阶层的墓葬里并无发现，说明贮贝器是当时贵族的专属器物。

迄今为止，考古发现最早的青铜贮贝器年代为战国。古人信奉“事死如事生”的理念，统治者、权贵们为了能够实现延续财富的寄托，死后将大量的贝币储存于贮贝器和铜鼓等礼乐器等一同带入墓葬，由此体现出墓主人生前不仅拥有大量财富，还有极高的权

力。经历了2000多年的风雨变迁，贮贝器上雕铸的攻伐交战、集市买卖、骑马狩猎、虎豹搏杀等场景依然能够让我们感受到曾经的热闹鲜活。贮贝器铸造之初是用作储存财宝，但它更像是一枚“时间胶囊”，让我们穿越时空，一睹两千年前古滇国人的生活……

一眼千年，热热闹闹的青铜贮贝器如今静置于博物馆的安静幽深中，从古人生活场景穿越至今，为观者上演了一出出尘封千年的往事！

（作者单位：昆明市晋宁区博物馆）

夺来往船只财物。在其反复招降无果后，出兵生擒匪首，肃清了航道海盗，维护了苏门答腊的稳定，使“番人赖以生计”。这样一些协助当地“治安”的举措，加深了中国与海外各国的友好关系，实现了“协和万邦”的使命。据史料记载，随着郑和下西洋期间及后期，有4个国家11位国王亲至中国访问。永乐二十一年（1423年），甚至出现了古里（今印度西南部）、忽鲁谟斯（今伊朗东南部）等16国均派遣使节共1200人到明朝访问的盛况。

此外，永乐九年（公元1411年）七月，满刺加（今马六甲）国王拜里迷苏刺率领其妃、子、陪臣一行540余人来华访问。明成祖闻讯后，即派遣中官海寿、礼部郎中黄裳等人前往设宴慰问。到京后，又亲自在奉天门设国宴招待，命安置于会同馆，命礼部赐给国王金绣龙衣2袭，麒麟衣1袭及金银、器皿、帷幔、被褥，赐王妃及其子侄、陪臣、仆从、文绮、纱罗、袭衣。永乐十七年（公元1419年）九月，拜里迷苏刺的儿子亦思罕答儿沙嗣立为满刺加国王后，亲自率领王妃、王子来华访问。永乐二十二年（公元1424年）三月，亦思罕答儿沙的儿子西里麻哈刺者继位后，率领其王妃及头目来华访问。宣德八年（公

元1433年）九月，满刺加国王西里麻哈刺者再度率其家属、头目一行人来华访问。明宣宗得知后，认为当时北京天气逐渐转寒，恐他们不适应，下令暂时在南京休息，加倍厚待之，待来年春暖时来京。22年间，满刺加国不远万里多次到中国访问，当中也是有郑和七下西洋五次驻节马六甲，与马六甲人民建立起的深厚友谊的渊源。

“郑和七下西洋”作为中国航海史上的辉煌历程，被多次载入中国历史典籍，如马欢的《瀛涯胜览》、费信的《星槎胜览》、巩珍的《西洋蕃国志》、罗懋登的《三宝太监下西洋记》等，其本人更是在东南亚各国受到尊崇和敬奉，各地都建有以郑和名字命名的寺庙、建筑物等，郑和成为中国与周边各国进行文化交流，增进了解，促进彼此间友谊的重要纽带。

回首明永乐三年六月十五，公元1405年7月11日，中国航海家郑和正式扬帆启航远赴千万里，突破重重困难，远播文明和友谊，再看当下建设“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新征程徐徐展开，真可谓“星牵沧海系天涯，丝路绘就新格局”。

（作者系云南省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文献研究所副研究员）